

长征，一群年轻人的突围

出发时，没人知道要去哪里、能走多远。包括毛泽东、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等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都不知道，此行将去往何方。1934年10月，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一次远征。

多年后，当邓小平的女儿问起长征时他都干些什么工作，邓小平只回答了3个字：“跟着走。”

有人说，“长征，实际是由一群孩子来完成的”。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。如果以长征开始时计算开国将帅的平均年龄，9位元帅为36.5岁，8位大将为31.7岁，48位上将为25.9岁，157位中将为23.8岁。

主力红军的长征队伍里，约54%的战士在24岁以下，甚至还有9-12岁的少年。他们常常这样回答参军的原因：“我们没吃没穿。”

这一走就是两万余里，经过11个省（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，是15个省份），渡过20多条大江大河。

采访过不少红军将士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这样描述此次旅途：“冒险、探索、发现、勇气和胆怯、胜利和狂喜、艰难困苦、英勇牺牲、忠心耿耿，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、始终如一的希望、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，像一把烈焰，贯穿着这一切。”

“既瞒住了蒋介石，也瞒住了自己人”

但在1934年秋天，共产党正处于危机之中。在中国赣南的角落，革命根据地正越缩越小。1933年，为第五次“围剿”革命根据地，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，自任“剿匪”总司令。国民党部署建造了大量碉堡，包围中央苏区，切断贸易。这个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新战术，让蒋介石得意，“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”。

1934年10月10日，《民国日报》发表社论，称“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”。

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一个秘密转移计划早在酝酿。那段时间，在红军司令部所在地，人们见面总说“转移的时间要到了”，有时还互相问：“你走吗？”

红军出发的队伍庞大而杂乱，“就像大搬家一样”。以中央机关的辎重队伍为例，约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印刷机、造子弹机器、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、装满文件的箱子，还有大量银元、金条、大米、药品、备用的枪炮、收发报机、电话设备、电话线等。后来的战役证明，这些沉重的物品使得队伍行动缓慢，一些装备、文件、衣服不得不沿途丢弃。

当时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毛泽东，在中央机关纵队出发几天后才与其他队伍出发。

焦虑的情绪很快在队伍里蔓延。开国上将杨成武当时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，他在长征出发两天后就遇到战士的询问：“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。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？”

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？”他只能回答：“目前朝西北方向行进，将冲破敌人的封锁。”

同样跟着走的还有出发时48岁的董必武，他在红军队伍里岁数较大。“转移到什么地方、经过什么路线、走多久等都是军事上的秘密”，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一连问了自己几个假设，发现假使出发前就知道此后的种种，“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？这都不能悬揣”。

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将这次撤退与转移定义为“仓促的出动”：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、当前任务怎样、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，始终秘而不宣。留守在根据地江西于都城里的人也意识到情况非常，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军人集结又离开。

实际上，除了中央红军中最高级的指挥员，约8万名战士并不知晓今后将要执行什么任务。在长征结束近50年后，74岁的曾宪辉还能回忆当时出发时的行装：5磅大米的干粮袋、100发子弹、两颗手榴弹、1支步枪和1套棉衣，负重共65磅。而当时他和大部分的年轻战士一样，只知道部队要转移，“对长征一无所知”。

但中央苏区里发生的事却让这个秘密行动似乎有迹可循，一些准备工作已在悄悄进行。

1934年春天，两年前藏于瑞金附近山洞里的大批财物被搬出，这其中包括100多万枚银元。大规模的征兵与征粮运动也在那年的春夏之交进行，1934年5月，当时24岁的曾宪辉忙于扩大红军规模的工作，在登记了1000名入伍者后，他自己也参了军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地的车间也开始修理枪支武器，生产新的手榴弹。

那年夏天先行转移的两支队伍也在日后被认为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。一支是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的红七军团，一支是由江西碧溪、新江地区向西出发的红六军团，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及这两支队伍的任务：一支是探路、一支是调敌。

保密的结果是有效的。史料记载，中央红军走了一个星期后，国民党5省“剿匪”联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于10月21日向西路总司令部参谋长转发蒋介石的电报：“综合各电，判断匪之企图西窜行将实现。”

高度保密措施的影响是双向的。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孙伟分析，红军的秘密“既瞒住了蒋介石，也瞒住了自己人”。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总结说，西征之前，在党内、军内和群众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，这影响了红军指战员的热忱与积极性。

“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，我还能说什么呢”

红军行军的感受十分复杂。失败的阴影一度笼罩着这支队伍：湘江一役极为残酷，10月开始长征，到12月1日渡过湘江，中央红军从最初8.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。渡江后逐渐晴朗的天气也没能散去中央纵队红军的悲伤。他们曾站在湘江西岸，面对满江漂浮的战友遗体，失声痛哭。

而在没有敌情顾虑的夜晚，战士们“不知东方之既白”，据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富春回忆，他们大扯乱谈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，声彻云霄。他笑称在总政治部的队列中，组成了“合股牛皮公司”，“上下古今地乱谈，也忘记疲倦，也忘记骑马”。

路漫漫，队伍逐渐适应了在小路夜行，把日间的生活改到晚上，还习惯了边走边睡。用李富春的话来说，“坐在马上，固然可以瞌睡，走路也可以瞌睡”。

士兵们把背上的包袱换成白色，好让身后的同伴看清。在能够点火把夜行的晚上，他们感受壮丽，看到达山顶的部队“宛如一道长龙，金鳞闪闪，十弯十曲的蜿蜒舞蹈”。

与行军的艰难相比，精神上的愉快显得那样珍贵而短暂。“爬雪山，过草地”，苦不堪言。过草地时29岁的邓发在长征结束后曾撰文回忆，在草地的7天，他度过了最快乐的一晚，大家谈故事、唱歌、吹口琴，当时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、文学家成仿吾还受邀讲起他留学日本后又留学德国的经过，分享学习创作文学、小说、诗歌等的历程。

据他回忆，红军过草地时已出发快10个月，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。气候奇寒，有人穿着各种野兽皮，如羊皮、虎皮、驼皮、狗皮，“真是五光十色”。

在充斥着“多远”和“去哪”疑问的行军途中，曾经抗婚出逃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蔡畅用法文唱起的《马赛曲》，常让当时20多岁的康克清“受到鼓舞”，这位渔家女后来告诉美国记者哈里森·埃文斯·索尔兹伯里，长征就像在野外“散步”，“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”

在萧克的红六军团，一度被误认为是间谍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也跟着走了18个月，度过了两次新年。他记得一次露营，自己要求睡在门口，以便在夕阳下找找虱子。“我开始计算那些吸血者的数字，粗略算了一下竟有500之多”。

1935年圣诞节，这个用毛巾包住头、一副俄国农民打扮的异乡人随队伍爬上高山，望着远处酷似瑞士木屋的农舍出神：“这不就是给我的贺年卡吗？”

当他收到妻子和母亲寄来的信和照片，一批批同志们“来看照片，并好奇地摸摸”。勃沙特后来回忆：“他们看照片时，人类的天性使我们和谐起来。”

他曾听过不少红军战士谈起湖南的桑植县，这是红二、红六军团突围的出发地，一位战士还在一次爬坡后唱起“那是我的家”。

“自然的暴力”有时比绵密的弹雨还要可怕。离家的年轻战士起初还会笑同伴跌跤，到后来谁也不敢笑谁，“自己正笑时也跌倒了”。长征中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徐梦秋回忆，藏区草地的山坡“真叫人不敢领教”，尽是“水草没胫的沼地”，在极难走的山坡上，“现在谁也没有笑的心情，特别是笑的力量。一方面是自顾不暇，另一方面自己也同样是（被）笑的对象，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跌跤”。

有一次，从一二十里之外挑回五六十斤麦子的朱德问这些红军战士：“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，唉！什么青年？”在寒冷的雨夜，罗荣桓、贾拓夫等知识分子为生火

“费尽心力”，“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……火柴是早已不见了，在毛儿盖又没有找到火石，此时只有向别个棚子告艰难”。

这些在历史中被定格为“叫花子”形象的官兵，总能想到办法相互鼓励。他们在山脚写的标语里提出爬山竞赛。勃沙特回忆，其中另外一些标语的内容不能当真，“如‘到山顶了’仅意味着尚在半山腰，如‘不远了’则意味着尚差十英里之遥，如‘到了’意味着至少还差五英里”。

红军总共翻越了20座山，有5条山脉终年积雪，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。

“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有个饭碗，而是为了胜利”

后来人们回溯这次远征，总要提及意志的胜利。在绵延万里的一追一逃中，红军最终在漫长角逐中胜出。索尔兹伯里说，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，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，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。他曾听到杨成武将军分享过一段对话——两位老人谈论红军作战，一位问：“他们的子弹都不多，怎么总是打胜仗？”另一位回答：“他们日走千里，夜行八百，刀枪不入，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？”

“团结”成为一支队伍制胜的关键，而对这一点，共产党的军队显然更理解其背后的力量。

在长征出发后的几个月里，有关作战方针的争论始终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发生。生死关头总有关于前路的激辩：到底去不去湘西？打正规战还是运动战？进攻还是保存实力？

很快，更符合当时实际的策略得到了大部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。充满交锋的遵义会议，让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。

1936年2月5日，在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“鸡鸣三省”处，在遵义会议上连连叹气的博古交出了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、记录、印章的挑子。一个多月后，毛泽东与周恩来、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“三人军事指挥小组”成员。

此后，一支逐渐成熟的队伍最终以4次渡过赤水河的战略战术，成功突围。这意味着，不仅红军的军事路线正逐步统一，被共产国际“包办”了21年的这支队伍，也终于开始以实事求是为根本，决定自己的领导人与路线。

起初更有胜算的国民党军队却在围追堵截的一路，屡屡碰壁。那些相互捆绑的“剿匪”伙伴，各有各的顾虑，总在触及自身利益时却步不前。

桂系军阀白崇禧的想法就代表了当时一些地方军阀的困境：不能输，也不能赢。在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高参刘斐的回忆里，大约1934年10月底，蒋介石再三来电，要广西与湖南竭力堵截，将共军歼灭于湖南、桂北地区，而白崇禧左右为难：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，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。

类似“不拦头、不斩腰、只击尾”的“送客”方针散见于当时一些地方军阀军长的回忆录里。在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后，蒋介石电令薛岳率部追击。而当时跟随薛岳追击红军的

第四军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回忆说，大家自嘲“一路送行到贵阳”，当时红军在沿途还写下标语：有劳远送。

早年追随孙中山、之后成为抗日名将的薛岳，后来用手画着圈向侄子薛维忠解释孙中山与蒋介石“打天下”的不同，“孙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……圈越画越大，而蒋先生打天下……圈越画越小”。

在长征队伍里的基督教会医生傅连璋观察，“红军不只爱朋友和家庭，而且爱祖国和人民大众”。他后来成为一位将军——长征之后，共产党实现了更广意义上的团结与统一。

长征结束后，斯诺在宁夏碰到了强渡过四川大渡河的几位战士，他对他们的年轻感到惊讶。斯诺在后来的《西行漫记》中写下：“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有个饭碗，而是为了胜利。”

（资料来源：《中国青年报》，2021年1月25日）